

傳教士莫安仁與廣學會的編譯出版事業¹

楊華波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提要

廣學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近代來華傳教士設立的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知識空缺和救亡危機中，其發行的報刊及編譯的書籍極大推動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變革，在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作為基督教文字事工領域的知名著述家，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莫安仁（Evan Morgan, 1860-1941）因早年在山西和陝西傳道，未能在廣學會極盛之時大顯身手，但自 1906 年調入上海就職於該會後，他迅速成為會內最多產、最活躍的西人編輯之一，不僅主持教會著名刊物《大同報》（*The Chinese Weekly*）多年，還筆耕不輟，編譯了包含西學、西政、西教內容在內的書籍數十種，在世俗和教會兩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 1924 年非基督教運動來勢洶洶之際，他臨危受命代理總幹事一年，時間雖不長，但其主持下的廣學會卻逆流而上，回應了社會上各種思潮對基督教的否定和批判，甚至迎來了難得的出版高峰。此外，在出版理念上，莫安仁深受廣學會早期領導者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社會福音思想的影響，重視與中國政治的勾連，堅持社會啟蒙與福音傳播並重，在會內很好地繼承了李氏的精神遺產。總之，莫安仁多元且豐富的文字佈道理念和實踐推動了廣學會在晚清民國年間的轉型，有力鞏固並拓展了廣學會的編譯出版事業，使其在民國年間競爭激烈的出版界始終佔有一席之地，是該會發展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

關鍵詞：莫安仁、廣學會、《大同報》、編譯出版

投稿時間：2023.12.08；**接受刊登：**2024.02.27；**責任編輯：**林宜慧

¹ 本文曾於 2023 年 9 月在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的「中外文化交流與國際漢學工作坊」上宣讀。感謝四川大學陳建明教授對本文的批評指點，亦感謝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對筆者的悉心指導。對於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詳細修改意見，筆者表示由衷的謝意。

壹、前言

在風雲變幻的近代中國，廣學會因其與中國政治、文化、教育的深度聯結，早前已受到學界的諸多關注（如何兆武，1961；王樹槐，1965：33-90，1973；孫邦華，2000），而在中國近代教會史和出版史研究中（如鄒振環，1996：98-105，112-116；李志剛，1997：148-162，163-178；葉再生，2002：405-476；陳建明，2015），廣學會更是繞不開的重點，但遺憾的是，已有論述中卻長期存在著訛誤及不盡詳實之處。首先，針對廣學會在清末及民國初年的轉型及後續發展，學界至今仍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恰當的評價。眾所周知，在戊戌變法前後數年以及清末新政時期，廣學會因有效彌補了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空缺而聲名大噪，連光緒皇帝和地方督撫大員也紛紛購閱其書或給予捐助，其影響力可謂無以復加。（熊月之，1994：559-564）然而，隨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出版機構的崛起，國人越來越成為知識救國的主導者，帶有宗教色彩的出版物彷彿一夜之間成為了時代的棄兒，以致廣學會在民國年間雖持續活動，出版書籍遠超千種，卻仍被籠統認定為價值不高，因此缺席民國出版史的編納。（吳永貴，2011：6-9）而事實上，廣學會早在戊戌變法之後便敏銳覺察到了時勢的變化，在一系列的調整轉向之後，它不僅在西學知識的大眾化方面貢獻良多，在宣教讀物和神學著作的編譯出版領域也有所成就。

其次，在廣學會事業的領導者方面，儘管集聚了教會中的一眾文字精英，但學界多關注主持該會並將其推向影響力最高峰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以及民國初年維持大局的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 1862-1931）（梁元生，1978；李巍，2003；陳喆，2013；張湧，2018），對其他服務於該會並將編譯出版視為終身事業的傳教士關注不足。譬如在廣學會興辦的報刊中，林樂知主持的《萬國公報》（*The Review of the Times*）堪稱該會對外宣傳的喉舌，但1907年公報停辦後，繼起的《大同報》（*The Chinese Weekly*）則無疑是其過渡時期最重要的刊物，它不僅在清末新政中充分發揮了議政論政的功能，還有力地影響了民國初年的社會輿論，然而時至今日，該刊的特色、貢獻，尤其是主編的個人生平與活動卻鮮少得到深入探究。

拋開先入為主的成見，筆者採用長焦鏡頭回看廣學會的完整歷史，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戊戌變法之後的廣學會雖巔峰已過，其出版方針、活動

及社會影響是否有新的變化，且應作何評價？二，廣學會在後李提摩太時代，其主要人物除季理斐外，是否還另有其人？翻檢史料之後筆者發現，廣學會在清末民初的調適及後續發展並非乏善可陳，即使在民國年間，它仍在不斷回應中國社會的種種需求和詰難，並試圖對中國各個領域施加新的影響。而在這一過程中，莫安仁（Evan Morgan, 1860-1941）便是一位在廣學會轉型及民國初年發展中起到重要串聯作用，並做出卓越貢獻的傳教士。

莫安仁 1906 年加入廣學會，前後服務該會近三十年，除編輯《中西教會報》（*The Missionary Review*）和《大同報》等報刊外，還譯述了數十種以西學和西教為主題的著作，在清末民初廣學會轉型時期出力頗多，稱得上是該會由注重編譯實用新知、實行上層路線，並進而過渡到專注於福音傳播和宗教出版的靈魂人物之一。遺憾的是，儘管莫安仁在廣學會的轉型中居功至偉，在近代出版界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現有研究卻多集中於探討他編輯的供來華西人學習漢語的新詞辭典和教科書（沈國威，2009；高永偉，2012；韓一瑾，2018；鳳媛，2024）及其翻譯注釋的道家經典《淮南子》（孟慶波、高旭，2018；程躍，2023），對其生平之敘述及出版活動之考訂多有不盡詳實之處。有鑒於此，本文擬綜合利用中外史料，全面深入鉤沉莫安仁在廣學會內的事蹟，重點考察其文字佈道思想及實踐對廣學會編譯出版事業所帶來的影響，從而挖掘一位廣學會歷史上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

貳、廣學會的歷史變遷與組織架構

「廣學會」是清末來華各差會聯合開辦的出版機構，1887 年由英國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牽頭設立於上海，初名「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韋氏因資歷甚高且出力最多而被推選為督辦。為擴大影響力，廣學會聘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擔任主席，並廣泛動員丁韋良（W. A. P. Martin, 1827-1916）、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和林樂知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入會，以編譯出版基於基督教精神的書籍及小冊子為己任。（陳建明，2015）此前，此類傳教士參與籌辦的出版機構並不稀見，如早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前的 1834 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和美國傳教士裨

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等人即已在廣州發起並創辦「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可惜存續時間較短，影響有限。（吳義雄，2000：420-428）1877 年第一次來華傳教士大會召開之後，韋廉臣和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等人亦曾在上海組建「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又稱學校及教科書委員會）。因益智書會專為教會學校提供教科書，未能涵蓋更廣闊的領域，韋廉臣乃起意創辦另一個嶄新的、服務於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出版機構，此即廣學會創辦的緣由。（賈立言，1937）

1890 年韋廉臣因病去世，在華歷練多年且頗有人望的李提摩太被公推為新的主持人。李氏當政期間極大推進了韋廉臣制定的目標，在社會福音思想（Social Gospel）²的引領下，他進一步超越了視文字為佈道工具的觀念，融西學啟蒙、社會改造與福音傳播為一體，不僅將同文書會改稱為廣學會，並將其目標讀者轉至官僚和讀書階層，廣泛出版政治、經濟、教育、歷史等領域的新書，甚至還與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維新人士來往，以期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策動中國改革自強。（孫邦華，2000）1898 年戊戌變法雖以失敗告終，但廣學會的影響力卻在變法醞釀及實行期間達到高潮，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一般士人，莫不爭閱其所出各書。其後，廣學會的勢力大為減弱，雖在科舉改制及新政期間乘勢而起，短暫復興，但畢竟後勁乏力，辛亥革命前後即已戰略收縮，將重心轉向為教會提供宣教及神學書籍，直至 1956 年與中華浸會書局等教會出版機構合併後退出歷史舞台。（李志剛，1997：165-167；陳鈴，2018；楊華波，2020）

在近七十年的歷史中，為應對中國社會的新發展，廣學會沒有止步不前，而是隨著中國時勢不斷調適，在組織架構上也多有優化，而此項工作的中心便是對出版部門進行細分整合。創辦初期的廣學會專注於西學啟蒙及文字佈道，會務由編輯部主理，它們由董事會委任的三至四名傳教士組成，全方位負責該

² 社會福音思想主張在個人得救之外革新世俗社會，全面提升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水平，將天國建設在人間。此一思想發端於 19 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後傳入中國，對 20 世紀初中國的傳教事業和社會改良產生了諸多影響。（王京強，2014）作為社會福音派的代表人物，李提摩太雖未必直接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影響，但他無疑是最早在中國實踐這一思想的傳教士，早在 19 世紀 70 年代他即有意識地轉變其來華初期採用的直接佈道的方式，開始積極推介西學、結交中國官員、投身救濟與教育等社會事務，因過於前衛，導致其與教會中的保守派不無衝突。（郭汶汶，2019）

會書報的編輯與出版，至 1916 年始設立專門的財經委員會和出版委員會；1934 年年底，為進一步提升出版效率，又在出版委員會下分設聖經讀物委員會、教會歷史與人物傳記委員會等六個下屬委員會，使得出版部門的職責日益顯要。（何凱立，2004：85-87）

在後李提摩太時代，廣學會雖較為沉寂，在社會啟蒙方面缺乏亮點，但在基督教文字出版領域卻仍然是毫無爭議的執牛耳者，其編譯的著作不僅被教會學校廣泛採用為教科書，還是地方教會及普通信眾不可或缺的讀物。1919 年之後擔任總幹事的是 1899 年加入廣學會的季理斐，他雖是李提摩太欽點的接班人，但其神學觀點較為保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會的進一步發展。（李巍，2003；陳喆，2013）而與季理斐並肩作戰二十餘年的莫安仁則更為開明，他具有社會福音傾向的文字工作恰好和季氏形成了良好的互補。在季氏主政期間，莫安仁長期擔任出版委員會幹事，負責具體的編譯出版事宜，還一度在 1924 年非基督教運動（後簡稱非基運動）風潮正盛之際代理總幹事一職，是 1931 年季理斐病逝之後廣學會內資歷最老、最富出版經驗的傳教士。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即使是在民國年間廣學會專心教會內部出版事務之際，莫安仁仍未完全放棄李提摩太宣導的社會福音思想和上層路線，而是不時將其貫徹於報刊與書籍的編譯出版之中，還在普及西學、開展漢學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深度影響了清末民初廣學會的發展。

參、莫安仁生平事蹟

莫安仁（圖 1）生於 1860 年，其出生地蘭格伊陶（Llangitho）位於英國威爾士西部的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緊鄰李提摩太的故鄉卡馬森郡（Camarthenshire）。因英國教會復興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丹尼爾·羅蘭（Daniel Rolands, 1713-1790）生長於蘭格伊陶，故此地深受循道會的影響。身處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莫安仁很早就完成了宗教啟蒙，但在個人信仰上，他最終親近的卻是浸禮會。經過短暫的學校教育後，莫安仁依靠自學考入了專門培養牧師的布里斯托浸會學院（Bristol Baptist College），在此不僅接受了系統的神學教育，還受到了劍橋學者顧樂偉（Terrot R. Glover, 1869-1943）思想和學說的影響³。

³ 顧樂偉長期執教於劍橋大學，雖以古典文學研究見長，但也多有涉及基督教之處。

1884 年秋天，莫安仁被教會派赴中國，抵華後先在山東煙臺學習漢語，在此結識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2），後對其結交達官貴人的傳教方式多有取法。（莫安仁，1927）結束半年的語言學習後，莫安仁被派往山西太原傳教，1895 年又被派往緊鄰陝西西安的三原地區。在三原期間，莫安仁曾代理分發廣學會出版物，促進了當地的西學啟蒙，如國民黨元老于右任（1879-1964）便通過其帶去的《萬國公報》等書報瞭解世界大勢，大開眼界。（于右任，1986：270）1900 年義和團運動波及陝西，莫安仁在巡撫端方（1861-1911）的幫助下逃過一劫，輾轉到達上海，從此與後者相知相識。同年，莫安仁返國休養，1902 年重返中國後，他又在人員短缺的太原工作了四年，與後來擔任巡撫的丁寶銓（1866-1919）相交甚篤，並經其舉薦，獲清政府頒賜三等第一寶星（圖 2）。

由於所屬的浸禮會較為開通，主張在直接傳教之餘兼顧社會性事務（張德明，2013），同時也因為同事李提摩太是上層路線的堅定信徒，受此影響，莫安仁的傳教方式屬於典型的社會福音派，不以直接佈道的傳統觀念自縛手腳，而是熱心時務，積極結交中國上層官僚及開明士紳，並勇於對中國的政治、教育和社會問題建言獻策。1906 年，在新政的高潮期，經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斡旋，並經浸禮會首肯，莫安仁被調往上海，全職工作於廣學會，正式開始其豐富且漫長的文字生涯。此前，莫安仁與廣學會已多有交集，他從 1897 年起即申請成為會員，同時還擔任該會陝西興安府書庫的負責人。在廣學會工作期間，莫安仁主要負責編輯《大同報》，也曾代理《中西教會報》編務，是民國初年廣學會內與季理斐並列的資深編輯。在 1924 年中國社會甚囂塵上的非基浪潮中，他代理總幹事一年，頗有作為。作為會內最多產的西人編輯之一，莫安仁譯述甚豐，其中又以宣教和神學方面的書籍居多，因成績斐然，英國威爾士大學於 1925 年授予其神學博士學位。

不為人知的是，莫安仁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漢學家，他不僅編纂了眾多供西方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和辭典，還開創性地翻譯了《淮南子》這一道家經典，贏得了西方學界的廣泛讚譽⁴。1911 年因好友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

（Aubrey, 1953）因欣賞顧樂偉的神學觀點，在廣學會工作期間，莫安仁不僅翻譯其著作多種，還於 1924 年代理總幹事期間將其言論置於年報扉頁，作為該會下一年度的工作綱領。

⁴ 對於莫安仁漢學成就的梳理與討論，可參見楊華波（2025）。〈傳教士莫安仁及其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 44 卷，第 1 期，待刊。

1945)的介紹,莫安仁開始主持「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會刊的編務,更於1933年當選為會長,為該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王毅,2005:31)學術工作之外,他還參與了上海威爾士僑民組織聖大衛協會(St David's Society)的創建,兩度擔任會長,在上海西人社區擁有很高的聲望。1935年,在華服務達51年之久的莫安仁正式退休,與其妻子回到英國布里斯托養老,直至1941年去世⁵。

縱觀莫安仁長達半個世紀的在華活動,1884年至1906年加入廣學會前其一直處於邊緣地位,主要在山西和陝西這樣的內陸偏遠省份傳教,且未能致力於其更為擅長的文字工作,故而鮮少能在中國社會產生大的影響。而在加入廣學會至1935年離華返國期間,他隨即從幕後走上臺前,直抵近代中國的中心區域,並借助廣學會在知識界和宗教界的聲譽而大放光彩,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因對中國語言文化的深刻理解,莫安仁成為教會文字佈道工作的理想人選,不僅多年負責廣學會的出版事務,甚至還主導了清末民初廣學會轉型時期的書刊編譯,極大推進了該會的出版事業,在其中後期的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肆、編輯及主持《大同報》

由於浸禮會對文字工作的重視,莫安仁一踏上中國便受到了較為嚴格的漢語教育,「在初時便知道文字乃傳教事業中一樁重要的因數」,再加上受到花之安(Ernest Faber, 1839-1899)、李提摩太和仲均安(Alfred G. Jones, 1846-1905)等著述家的感召,他很早即立志以文字佈道(莫安仁,1925:23)。雖然系統學習漢語的時間不長,但憑藉持之以恆的自學,再加上教會的鼓勵和支持,數年後莫安仁便掌握了扎實的漢學知識,也具備一定的漢語書寫能力,而這也是進入廣學會工作的必要條件。通觀廣學會內的西人編輯,莫安仁之前的李提摩太、林樂知、季理斐和高葆真(William A. Cornaby, 1861-1921)莫不如此。在著述人才稀缺的年代,莫安仁因其語言文化素養得以成為他們的同道(圖3)。1906年正是廣學會編輯人員捉襟見肘之時,季理斐和高葆真先後休假,

⁵ 關於莫安仁生平,本文依據的史料主要有 Evan Morgan (1928). Past and Present Aims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59, 1: 42-46; Obituary: The Rev. Evan Morgan, D. D. (1941.8.8).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3; Obituary: Rev. Evan Morgan D. D. (1941.9). *The Chinese Recorder*, 72, 9: 509-510.

隔年林樂知病逝，莫安仁的加入可謂正當其時。早在創會伊始，韋廉臣便定下了文字工作的宗旨，即「出版和發行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种書籍」（〈同文書會（前中國書刊協會）組織章程〉，1988.6：31），而在加入廣學會當年的年會中，莫安仁重申了這一基本原則，強調「一切出版物都要圍繞宗教和上帝展開」（C. L. S., 1906: 42），為其此後的編譯出版活動定下了基調。

主編《大同報》無疑是莫安仁在廣學會大顯身手的難得契機，而《大同報》在清末民初的兩次轉型也深深鑿下了他個人的烙印。需要指出的是，廣學會早期僅有兩份報刊，分別是 1889 年復刊的世俗刊物《萬國公報》和 1891 年創刊的教會內部刊物《中西教會報》。因《萬國公報》為月刊，發行週期較長，為補其短處，廣學會乃於 1904 年另辦《大同報》。然而《大同報》雖名為報，實為登載論說及新聞的週刊，由英國循道會傳教士高葆真主編⁶。1906 年因高氏回國休假，莫安仁甫入廣學會便被委以主編的重任⁷。上任伊始，他就主導了《大同報》的改良，進一步減少其宗教意味，擴大時政等內容的版面，大幅增加與政治革新有關的新知，甚至開設了專門的「憲政」欄目，以適應中國社會的新發展。其時正值清政府厲行新政，廣學會將《大同報》的改版視為呼應中國政治變革的必然之舉，指出：「中國而欲振興也，則必自政治之改良始；政治而欲改良也，則又必自報章之改良始」（〈論著：大同報改良發刊詞〉，1907.3：6）。

為了對新政施加有力的影響，莫安仁在《大同報》上發表了眾多社論以備當局參考，主要是各項改革建議以及對西方農學、經濟學和教育學等實用新知的譯介宣傳。值此傳統與現代激烈衝突之際，他和李提摩太均堅持新舊並重，而不是一味求新，主張吸納一切有助於中國革新的新學舊知。在 1907 年《大同報》首次改良時，莫安仁對「大同」二字作了全新的闡釋：

蓋大同二字，義主平和，本不願其有門戶競爭思想，而特欲合五洲萬國為一家，玉帛同盟，兵戈永戢，藉以裨益中外，天下之大利在

⁶ 高葆真自 1885 年來華後長期在湖北漢口及漢陽佈道，1904 年經其所屬的循道會同意，調入廣學會工作，除參與編輯《萬國公報》和《中西教會報》外，更創刊《大同報》，對其早期發展多有貢獻，但 1912 年之後他因個人原因逐漸淡出廣學會。（姜劍，2021）

⁷ 此外，1907 年莫安仁還同時主持《中西教會報》編務，除在該報發表神學論著外，還與華人筆述者徐惟岱合譯連載《農學新法》，反映了他佈道與救世並重的文字觀念。

於是，中國之大利在於是，而本報庶亦得珥筆雍容，獻可箴替，贊襄萬一耳。今觀環球列強，虎視鷹瞵，方眈眈逐逐，以恣行其割據分爭手段，而本報則立意惟求平和，既不欲揚外抑中，以瓜分起壓制之漸，亦不欲揚中抑外，以滅洋生仇視之心。且也尊今不法古，維新適以召危機，而本報則不背今亦不背古；泥古不通今，守舊即以開黨錮，而本報則不失古亦不失今。蓋言外不言中，拘一隅必昧乎全局，而知今不知古，循一轍亦忘乎遠模。（莫安仁，1907a：5）

回溯 1904 年創刊時期的《大同報》，因目睹列強在華競逐利益造成種種禍患，其主要使命在於「化其偏見，泯其仇視，地無分歐亞，人無分黃白，而一歸之於大同之中」（〈附錄：記大同報〉，1904.3：30 上），改版後的《大同報》在延續這一調停中外衝突的初心之外，還進一步明確其不偏不倚的立場；「大同」二字輻射的範圍也大為擴展，直抵思想文化領域。這一宗旨體現出廣學會以調停中外、緩和古今為己任的姿態，代表了該會轉型時期在政治態度和文化觀念上的新動向。

政治上，因中國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廣學會由初期的鼓動中國變革自強，逐漸轉向採取中外相安無事的中庸路線。戊戌維新失敗之後，清政府內部舉棋不定，革命派聲勢日隆，再加上外國勢力紛紛介入中國事務，甚至於有瓜分的野心，中國政局愈加複雜。廣學會為謹慎持重起見，不再單純地以此前偏向清政府的改革推動者自居，而是奉行調和主義的新立場，力爭和平局面。因應政治態度上的變化，廣學會在文化觀念上也企圖有所調和，將中國文化中寓意深刻的大同二字作為中和古今中外的關鍵詞，藉此緩和各種新思想對傳統文化的衝擊。此時仍主持廣學會的李提摩太對此深表肯定，他在《新不廢舊之旨》一文中同樣表達了今不廢古、新舊並存的思想（李提摩太，1907），由此可見莫安仁與李提摩太在思想上的共通之處。反觀其後新文化運動中對舊文化和舊事物的猛烈批判，二人的主張似有先見之明，因而自有其可貴之處。

雖然在政治立場上親近當局，但由於並非一邊倒，在登載內容上，利用外國人辦刊的特殊背景，《大同報》頗能言人之未敢言。如莫安仁將報紙這一新式媒介視為主持社會正義、監督當權者的有力武器（莫安仁、管鶴，1907），甚至對政府無故壓制報館的舉動予以激烈的批評（莫安仁、徐惟岱，1907a），認為限制自由言論於國於民都極為不利，要求放寬對報紙的管制。到了民國初年，他仍在《大同報》和《東方雜誌》上撰文提倡自由言論（莫安仁，1916，

1917），主張充分發揮報紙移風易俗、正制度人心的作用。作為少有的與李提摩太一樣熱衷於議論時政的傳教士，針對新政期間朝野熱議的話題，在加入廣學會伊始，莫安仁便在流播甚廣的《萬國公報》上發表了《論國家整頓財政之要》和《化除滿漢畛域議》兩文（莫安仁，1906，1907b），意在為中國的財政問題和種族問題陳述一己之見。此外，他還在國人自辦的報刊上對中國時局發表看法，如他曾同時在《時報》和《神州日報》上刊文批判軍閥干政（莫安仁，1918a，1918b），顯見其文字佈道之外的社會關懷。

1915 年因廣學會經費支絀，再加上在英休假期間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災難，返回中國後莫安仁又主持將《大同報》由週刊改為月刊。全新改版的《大同月報》（*Ta Tung Pao*）將呼籲各國早日休戰、謀求世界和平作為論述的重要主題，這無疑又賦予「大同」二字新的時代內涵。除了新增版面並保持週刊時期的時政特色外，《大同月報》還進一步擴展了文藝部分的版面，其「雜纂門」刊登了文壇領袖林紓（1852-1924）、鄭孝胥（1860-1938）及廣學會華人文士許家惺⁸等人的詩詞作品，體現出新舊並包的特色。對於《大同報》改版後增設的副刊，學界目前研究不多，但其中頗可透視教會出版機構在推動近代文藝發展方面的貢獻，如該刊首登許家惺之《問高齋齋筆記》及其父許傳需所著之《一誠齋詩存》，還刊登了華人編輯哈文藻、徐惟岱等人的詩詞創作，為身處文化界邊緣的傳統文人提供了難得的文藝空間。為提升影響力，《大同報》還屢登名家之作，如鄭孝胥《海藏樓詩集》和清代嘉道年間著名學者潘四農《養一齋詩話》中的詩文便多次見刊。鄭氏對《大同報》的文學旨趣評價頗高，其 1916 年 9 月 14 日日記載：「《大同報·文苑》兩登余詩，中有《養一齋詩話》，甚佳，潘四農德輿所著也。」（鄭孝胥，1993：1626）

在報紙的發行方面，莫安仁堅持上層路線，竭力爭取官僚階層的支持。雖然《大同報》創刊的初衷在於滿足內地偏遠省份獲取新知的需求，但不久廣學會主政者便改弦更張，將其改造為發揮《萬國公報》餘熱的替代品，企圖以此繼續影響官僚和智識階層。（Brown, 1938: 107）莫安仁擔任主編之時，其影響上層官員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他不僅在《大同報》上大幅褒揚官員，發表迎合政府的言論，還與李提摩太聯名致信興辦洋務的實力派盛宣懷（1844-1916），

⁸ 許家惺（1873-1925），字默齋，號東雷，浙江上虞人，因與汪康年（1860-1911）有舊，早年曾在《時務報》和《中外日報》任書記或編輯，為知名報人，後在李提摩太主持的山西大學堂譯書院譯書，校譯著作多種。許氏約於 1910 年加入廣學會，長年擔任《大同報》中文撰述，是民國年間廣學會最為倚重的華人筆述者。

請求其「鼎力提倡」，「按期飭代派銷，每大州縣壹百分，中州縣柒拾分，小州縣伍拾分」（上海圖書館編，2008：463），以此爭取地方政府對該刊的支持。經過一番努力，《大同報》的絕大多數訂戶為地方各級衙署，以至於1908年廣學會在年報中宣稱，由官員訂購的部分多達兩千五百份，占每期銷量的一半以上。當年《大同報》全年銷量一萬九千五百份，平均每期約四千份，除官方訂購外，還遠銷澳大利亞、巴西、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世界各地。（C. L. S., 1908: 9-10）

因為敢於言說、持論公正，再加上大規模派發社論稿件，《大同報》的文章被廣為傳閱，1914年年初的兩個月內即有六十八篇文章被轉載，即使到了1916年改為月刊且影響大不如前之際，在二十一篇被《大公報》、《申報》和《新聞報》等權威報刊轉載的文章中，絕大多數仍來自於這份廣學會內僅存的時政刊物。（Brown, 1938: 108-110）作為《大同報》的重要作者，莫安仁的撰述也在被轉載之列，如在1915年，他便至少有《國家果可不重道德耶》和《論國家道德之儲力》兩篇論說被《新民報》和《東方雜誌》轉載。（莫安仁，1915a，1915b）由於秉持基督教原則的社論迴響良好，1917年《大同報》停刊之後，廣學會將派發稿件的傳統延續下來，先是特設投稿部，至1919年更正式成立由季理斐主事的「自由投稿社」（Press Bureau），巔峰時期每年的稿件轉載量數以千計，遍及中國各省，行之十餘年而不衰，效果顯著。（廣學會，1923）而不得不提的是，這一創舉正是源於莫安仁主持《大同報》時期。

由於民國初年的廣學會仍有較強的政治藍圖，再加上莫安仁本人的社會福音情懷，《大同報》發表了數量眾多的世俗文字，它們看似與宗教無關，但其立意卻仍本於基督教原則。身為矢志佈道的傳教士，莫安仁對基督教思想的護持是一以貫之的，他堅持社會的良性發展「機關在於道德」（莫安仁、徐惟岱，1907b），而道德的核心便是基督教信仰（莫安仁，1915c）。清末民初時局動盪，教會刊物大多採取遠離政治的超然態度，但《大同報》卻始終不改其世俗本色，發表了諸多政論，在教會報刊中可謂首屈一指。（趙曉蘭、吳潮，2011：321）而《大同報》之所以能挾《萬國公報》餘威並有所開拓，正是得力於莫安仁的主持。他自加入廣學會後即與《大同報》結下不解之緣，自1911年正式接手編務，除偶有缺席外，執掌革新《大同報》直至其於1917停刊，見證了該刊的起落沉浮，在近代報刊史，特別是教會報刊史中書寫了屬於他的篇章。

伍、筆耕不輟、廣譯西書

除主持《大同報》並踴躍撰稿外，莫安仁還積極參與譯述書籍，其編譯之書在數量上可與廣學會內另兩位潛心著述的傳教士林樂知和季理斐相比。在編譯過程中，莫安仁採取的仍是傳統意義上的「口譯筆述」或「西譯中述」模式，即由他口述西文原書大意，再由華人文士筆錄潤色⁹。在中外人士均鮮少能獨立譯書的時代，這無疑只是權宜之計。可幸的是，由於具有良好的中國語言文化素養，與其合作的華人文士許家惺等人又多是中西文化造詣頗深的博通之士，莫安仁得以遊刃有餘地遊走於不同主題，跨越不同學科的界限，從而在近代西學東漸中有所成就。據筆者統計，莫安仁由廣學會出版的單行本著作多達六十餘種，其中清末民初，特別是1925年他被威爾士大學授予神學博士學位前的著譯最富價值，其目錄如下表所示。

表一 廣學會出版之莫安仁著譯簡表（1898-1925）¹⁰

年份	譯著	編譯者	原書	題材
1898	格致舉隅	莫安仁 口譯、 魏壽彭 筆述	Miss Buckley, <i>Fairy Land of Science</i>	科學
1904	物理標準	莫安仁 譯	Newth and Magnus, <i>Elementary Physics</i>	科學
1907	救贖精義	莫安仁 編譯	John Laidlaw, <i>The Scripture Idea of Sin and Salvation</i>	宣教
1908	日本教育之新調查	莫安仁 譯、 管鶴 述	<i>Japanese Educational System</i>	教育
	新譯伊藤總監 治韓政略	莫安仁 譯	<i>Marquis Ito and Corea</i>	政治

⁹ 關於中外合作譯書的流程，可參見傅蘭雅（1880：9）。

¹⁰ 本目錄的編製主要參考了張曉編著《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 明末至1919》（2012）、國家圖書館所編《民國時期圖書總目·宗教》（2021）以及上海市檔案館所藏《廣學會書刊目錄》（檔案號：U131-0-90）。由於莫安仁由廣學會推出的《文言與中國思想導讀》（*A Guide to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 1912）和《官話彙編》（*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1916）等語言類書籍是其自費出版，並未列入廣學會年報及出版目錄，因而此處不包含此類著作，僅呈現廣學會歷年年報及出版目錄中列明的條目。

	濮爾班克新發明種植學	莫安仁 口譯、 徐惟岱 筆述	Luther Burbank, <i>New Creation of Plant Life</i>	農學
1909	生計學	莫安仁 編譯	<i>Commercial Education</i>	教育
	新譯英國憲政輯要	莫安仁 譯、 徐惟岱 述、 管鶴 校勘	Frederick Wicks, <i>The British Constitution</i>	政治
	最近美國學務大全	莫安仁 口譯、 管鶴 筆述	<i>American Education</i>	教育
1910	新譯沙斐伯雷傳（一名英國近百年大事記）	莫安仁 參譯、 戴師鐸、管鶴 述詞	Edwin Hodder, <i>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 K. G.</i>	傳記
	世界教化進行論	莫安仁、 戴師鐸 譯述	E. P. Tenney, <i>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us Values in Social Progress</i>	神學
	宗教原理	莫安仁 參述、 戴師鐸 筆述	Robert F. Horton, <i>Religion in the Light of Modern Thought</i>	神學
	羅徹斯德正心譚	莫安仁 譯	Gilbert Burnet, <i>Conversation of Lord Rochester</i>	傳記
1911	進化真詮	莫安仁 參譯、 許家惺 述意	Dole, <i>A Renewed People</i>	神學
	宇宙進化論	莫安仁 述義、 許家惺 達旨	Arthur Thomson, <i>The Bible of Nature</i>	神學
	印度籌稅綱要	莫安仁、 徐惟岱 譯	Leonard Alston, <i>Elements of Indian Taxation</i>	經濟
1912	英國立憲鑑	莫安仁 口譯、 許家惺 筆述	<i>Rise and Settlement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i>	政治
	列強認承新政府之原理	莫安仁	<i>Recognition of the Republic</i>	政治
	生命世界	莫安仁 口譯、 許家惺 述義	Alfred R. Wallace, <i>World of Life</i>	生物
1913	格致概論	莫安仁 譯意、	John A. Thomson,	科學

		許家惺 述義	<i>Introduction to Science</i>	
1916	李斯特耳傳略	莫安仁、哈筱泉 譯述	Guy T. Wrench, <i>Lord Lister: His Life and Work</i>	傳記
	新約述要	莫安仁 口譯、周雲路 筆述	G. Campbell Morgan, <i>The Analysed Bible: The New Testament</i>	神學
	基督誡命	莫安仁 譯	Robert F. Horton, <i>The Commandments of Jesus</i>	宣教
1917	舊約述要（卷上）	莫安仁 譯、周雲路 述	G. Campbell Morgan, <i>The Analysed Bible: Genesis to Esther</i>	神學
	舊約述要（卷下）	莫安仁 譯、周雲路 述	G. Campbell Morgan, <i>The Analysed Bible: Job to Malachi</i>	神學
	泰西改良社會策	莫安仁 譯、鍾春暉、王調生 述	Charles R. Henderson, <i>Social Programmes of the West</i>	政治
1919	以賽亞述要	莫安仁、周雲路 同譯	G. Campbell Morgan, <i>The Prophecy of Isaiah</i>	神學
	歷史上之基督	莫安仁 口譯、周雲路 筆述	Terrot R. Glover, <i>The Jesus of History</i>	神學
	萬物精神論	莫安仁、王調生 同譯	James Y. Simpson, <i>The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i>	神學
	國際同盟論	莫安仁、王官鼎 同譯	Thomas J. Lawrence, <i>Lectures on the League of Nations</i>	政治
1920	信經輯要	莫安仁、周雲路 譯述	<i>History of Confessions of Faith</i>	神學
	何謂基督教	莫安仁 口譯、周雲路 筆述	Terrot R. Glover, <i>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a Christian Society</i>	神學
1921	如何與基督同在	莫安仁、周雲路 譯	W. Y. Fullerton, <i>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i>	宣教

			<i>Christ</i>	
	基督上服務模範（原名撒杜孫達爾傳）	莫安仁、周雲路 譯述	Mrs. Arthur Parker, <i>The Sadhu Sundar Singh, "Called of God"</i>	傳記
1924	原神	莫安仁 口譯、許家惺 筆述	Burnett H. Streeter ed., <i>The Spirit, God and His Relation to Man Consider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Art</i>	神學
1925	成人論（進化上的研究）	莫安仁、王調生 譯述	Oliver Lodge, <i>Human Life and Destiny, or the Making of Man</i>	神學
	科學與人生	莫安仁、周雲路 譯述	Robert A. Millikan, <i>Science and Life</i>	神學
	獄中人（名傳集之一）	莫安仁、周雲路 譯述	Caroline MacDonald, <i>The Confession of Tokichi Ishii</i>	傳記
	質疑答辯	莫安仁 著	Evan Morgan, <i>Friendly Answers to Religious Difficulties</i>	宣教

由上表可知，在 1906 年入職廣學會前，莫安仁即已在譯界小試牛刀，他先後在該會出版了《格致舉隅》和《物理標準》兩部介紹西方科學知識的譯作。其中，1898 年出版的《格致舉隅》起點頗高，藏書甚豐、博學多聞的徐維則（1867-1919）評價該書「每論皆明以圖，最便初學」，後將其收入自編的《（增版）東西學書錄》。（轉引自熊月之，2022：92）此外，據筆者查證，在西北佈道之餘，莫安仁還曾參與廣學會的出版計劃，在季理斐 1903 年主編的叢書中，他即承擔了 *Economics of Commerce*（《商業經濟學》）和 *Fundamental Ideas of Sin and Salvation*（《救贖精要》），此書或即為 1907 年出版之《救贖精義》）兩書的編譯（*In Preparation*, 1903），既顯露其選題傾向，也為其此後的編譯生涯作了必要的準備。

截止 1925 年，莫安仁共為廣學會編譯著作 38 種，其中民國建立前後數年間，莫氏之譯述活動並未落入單純借文字佈道的窠臼，而是呈現出世俗和神學

書籍並重的局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此時段的廣學會雖因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受挫，但並未完全放棄策動中國當局實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因而偶有世俗性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維新變法高潮過後，廣學會進入了調整期，開始重視教會內部信徒的需求，宗教色彩漸濃。（江文漢，1964）這一時期莫安仁譯著中最突出的是對西方政治和教育學說的引介，包括《日本教育之新調查》、《新譯伊藤總監治韓政略》、《新譯英國憲政輯要》、《最近美國學務大全》和《英國立憲鑑》，而其中關於英國憲政的譯介為最具特色者，且最有影響力。

在清政府施行新政的階段，《新譯英國憲政輯要》一書無疑具備很高的參考價值。作為曾赴歐美考察憲政並參與立憲改革的開明派官員，端方深知西方政治體系的組織與運作，在1906年回國後編著了《歐美政治要義》和《列國政要》兩書，對德國和義大利兩國的政治體制多有溢美之詞（張海林，2007：160），但在批閱莫安仁翻譯的《新譯英國憲政輯要》之後，他似乎對英國的政治體制更顯鍾情，將其視為中國立憲改革的模範，在序言中評價道：「世界立憲國推英為祖，其制定方法，半由習慣，其成立之早，尚在歐洲諸國中央集權、崇尚專制時代，故英為先進國，英憲法之制度條例又為各憲政國之先進。」（維克師，1909：序言）民國肇建，國會亦在草創之中，莫安仁又適時推出了《英國立憲鑑》，此書實為三部著作的合集，另兩部為《英議院權力發達史》和《英國憲政鞏固史》，堪稱民國初年系統引介英國憲政的集大成者。它們在結集前多已先期在《大同報》上連載，憑藉該報在官僚階層中的覆蓋面和接受度，可以想見，莫安仁的譯介將極大促進各級官員瞭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在廣學會的出版史上，莫安仁的政治及教育類譯著絕非對此前著作的簡單重複，而是有其獨到之處。眾所周知，李提摩太在戊戌變法前即已著眼於政治、經濟及教育等議題，翻譯了《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大同學》、《生利分利之別》和《七國新學備要》等書籍，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的思想和主張多有影響（張湧，2017：71-102），但平心而論，這些新學讀物難免空疏，更多是平地驚雷式的鼓動，缺乏對具體問題的切實指導。隨著清末新政的開展，廣學會吸取了戊戌變法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更務實的態度宣傳憲政和教育改革新知，而莫安仁無疑是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西人編輯，他對英國憲政的歷史和運作，以及日本和美國教育制度做了具體且細緻入微的譯述，延續並深化了廣學會致力於政治啟蒙與教育改革的社會

關懷。

除了充實李提摩太等人在時政領域的出版圖景，莫安仁還系統地引介了進化論學說，引領一時風氣，在教會內也尤有特色。如前所述，早在 1898 年，莫安仁便在華人文士魏壽彭的幫助下翻譯了《格致舉隅》，顯示其對生物學等科學知識的關注。此後，對進化論的譯述成為莫安仁編譯新學的重點，他直面現代科學對宗教的挑戰，採取審慎的態度考察進化論這一近代中國思想界的熱門話題，不僅在《大同報》上發表了《論人類天演進化之理由》這一專論（莫安仁，1911），還出版了《格致概論》、《宇宙進化論》、《生命世界》、《成人論（進化上的研究）》和《進化真詮》等一系列書籍。其中，作為最早在華譯介奧地利生物學家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學說的著作，《格致概論》曾由周建人（1888-1984）摘錄其中關於生物起源的部分刊登於《新青年》（周建人，1919），以較為通俗的方式宣傳了進化論學說，是新文化運動中少有的產生影響的廣學會出版物。然而，由於恪守傳播福音這一終極目標，莫安仁關於進化論的譯述無不將進化的動力歸為上帝的主宰和恩典，如其在《宇宙進化論》一書序言中聲稱，儘管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也部分遵循進化的規律，但「格致之說以察造物，愈以見上帝感化之神」（湯穆森，1911：序）。因此，莫安仁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譯介，甚至是較為客觀的評價，看似偏離了借文字佈道的目的，但實乃以退為進，其背後的動機仍是彰顯上帝的全知全能。

辛亥革命之後，廣學會長期堅持的上層路線基本破產，雖然李提摩太仍希望對新的政權施加影響，但以季理斐為代表的絕大多數編輯人員主張專注於教會內部事務。1916 年李提摩太退休返英，廣學會終於決定大刀闊斧地改弦更張，不僅將《大同報》停刊，不再如早期那樣頻繁對中國時政發表意見，還將有限的經費用於編譯《聖經辭典》、《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等大型工具書以及出版各種解經及神學著作，以滿足教會內部需求作為接下來的工作重心。在廣學會日趨保守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季理斐 1919 年接替瑞思義（W. Hopkyn Rees, 1859-1924）主持會務後，因應該會總體出版方針和季氏個人傳教策略的轉變，莫安仁編譯的世俗性著作大為減少，其參與譯述的書籍也以神學和宣教類為主，編譯了《歷史上之基督》和《基督上服務模範》等多種暢銷書，其中前者至 1931 年已印行至第五版，而後者至 1938 年也印行至第八版。此外，他還主持了《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的編譯。該書原為英國學者海丁氏（James Hastings, 1852-1922）主編的大型辭書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1908-1921），因卷

軼較多，廣學會自 1922 年開始翻譯編校，歷時數年才完成。後任廣學會總幹事的林輔華（Charles W. Allan, 1870-1958）在追憶此書的編譯出版歷程時曾指出：

海丁博士編著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在英國出版以後，廣學會便把它當作金礦般的看待。當時即議決擇該書的精華譯成華文，成一本簡明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而莫安仁博士則擔任主編的工作。這種工作也是非常艱鉅的，非經數年不能完成。後來，因中國時勢變遷，需要卷軼不多的書籍日增，於是在一九二六年便決議將已編譯好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的原稿再行刪削，同時又因印刷手續延誤，直到一九二八年該書纔出版行世。（林輔華，1937：6）

由以上引述可知，《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的出版可謂歷盡艱辛，最後仍有賴莫安仁總成其事。作為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本基督教倫理的工具書」（田文裁，2002：322），《宗教倫理百科全書》較此前出版的同類著作在內容上更為詳備，再加上編製精良，儘管並非全本，書成後還是被國內諸多神學院校收用為參考書，推動了中國神學教育及研究的開展，被著名神學家及教會史學家王治心（1881-1968）譽為廣學會歷史上「比較顯著的事工」（王治心，2004：260）。1927 年正值廣學會四十周年紀念，該會在已出版的近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中選取了十種劃時代（epochal）的著作，莫安仁主編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即與《泰西新史攬要》、《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和《中東戰紀本末》等鉅著共同入選（C. L. S., 1927: 5-6），可見廣學會對該書價值的認可。

在廣學會的工作重點轉變之後，為滿足教會內部對聖經的研讀，莫安仁還翻譯了英國神學家、劍橋查桑聖經學院（Cheshunt College）院長摩根（G. Campbell Morgan, 1863-1945）的多部著作，包括《新約述要》、《舊約述要》和《以賽亞述要》，這些譯著具有一定深度，非早期廣學會編譯的宗教小冊子等淺顯讀物可比。此外，莫安仁還在神學著作的編譯上取得了突破。因來華傳教士文字佈道中長期存在重直接宣傳福音、輕理論思辨的傾向，神學書籍在基督教文學中歷來是一塊明顯的短板，即使到了民國初年也未見改善（Clayton, 1919），而莫安仁則憑藉其良好的語言能力及知識儲備，成為破局的不二人選。除了早年編譯的《世界教化進行論》和《宗教原理》，他其後接連翻譯了《歷史上之基督》、《萬物精神論》和《原神》等諸多由西方知名學者編著的神學

書籍，如《歷史上之基督》的作者為劍橋大學學者顧樂偉，而《原神》的主編為英國學院派神學家、聖經學權威斯特里特（Burnett H. Streeter, 1874-1937）。由於原書堪稱一時之選，再加上編譯得當，莫安仁經手的這些具有一定學術性的神學譯著均多次再版，是彼時普及和提升基督教學理的難得文獻。

1935 年退休當年，廣學會董事會通過了對莫安仁表示感謝的決議，稱讚莫安仁多年的辛勤服務，特別是在出版領域給該會事業帶來的全方位影響，並特別提及莫氏編譯的書籍彼時仍有三十餘種在售。（C. L. S., 1935: 21-22）可以說，莫安仁編譯的書籍在題材上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神學，在程度上既有普及性的通俗讀物，也有專業性的學術著作，不僅展現了廣學會多元化的出版形象，同時也保障了該會在民國教會出版界中的領軍地位。

由於奉行上層路線，在推廣和主題選擇上，莫安仁的編譯活動往往與中國政治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主持的報刊和編譯的著作多得到過當局要員的推薦，如丁寶銓曾為其《大同月報》和《生命世界》作序（丁寶銓，1915；華麗士，1913：序），端方也曾為其《新譯英國憲政輯要》手書長序（維克師，1909：序言）¹¹。其中頗值一提的是，莫安仁多次表達過對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革命派在道義上的支持。早在清政府尚未傾覆時，他便在《大同報》上遙為呼應，讚揚西班牙志士費勒爾（Francisco Ferrer, 1859-1909）反抗政府的革命精神（莫安仁、徐惟岱，1911）；北洋政府當政時期，他又在《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評介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並將正在廣東積蓄力量的孫中山視為解決中國亂局的關鍵人物，其文後成為孫氏《建國方略》的序言並收入孫氏全集，進一步突顯了莫安仁社會福音導向下的政治參與¹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廣學會因經費支絀無法全面開展出版工作，連創辦十餘年的《大同報》也不得不停辦，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莫安仁也不忘關心時

¹¹ 該序為端方影印手跡，目前學界所知較少，似為研究端方與傳教士關係及其西學觀的必備文獻。

¹² 莫安仁發表在《上海泰晤士報》上的原文不詳，提及此文的出處為：〈輿論：莫安仁論孫總統為惟一解決中國之人〉（1922.1），《新建設的中國》，上海民國日報六週紀念增刊：頁 175-176。莫氏對中國政治的發展持樂觀態度，對於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並無敵視心理，這很可能是因為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已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而民國初年南北各地方軍閥也不如孫中山有號召力；此外，孫中山本人的基督徒身份對傳教士而言有著天然的親切感。莫文後被引為孫氏《建國方略》之序言，可參見莫安仁（1927）。〈《建國方略》序〉，《孫中山全集》，二集。上海：三民公司。

局。1916 年歐洲激戰正酣之際，他翻譯了《英國政策論》，詳細闡述了英國的外交方針，而在戰爭結束不久後的 1919 年，他又適時編譯了《國際同盟論》一書，由時任民國總統徐世昌（1855-1939）和清末黑龍江巡撫、民初平政院院長周樹模（1860-1925）作序，並請鄭孝胥題寫書名。此書竭力宣傳世界和平，力推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試圖為國際紛爭找到最佳之和平方案。李提摩太晚年孜孜以求地宣導世界聯盟（李振江，2015），莫安仁此時重提李氏的倡議，無疑體現了對其精神遺產的繼承。

然而，不同於李提摩太 1890 年在第二次傳教士大會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教會事業與中國政治的密切關係（Richard, 2016: 214），並在實行上層路線中尤其強調與李鴻章（1823-1901）、翁同龢（1830-1904）和張之洞（1837-1909）等督撫大員的直接交往，甚至於遊說他們採用其革新建議（茅海建，2021 :451-467），莫安仁雖與端方、丁寶銓和徐世昌等人相交，但深度有限，對政治的影響也較為間接，即使是與革命派和孫中山有關聯，也更多是無心插柳之舉，雙方未有進一步互動。總體而言，莫安仁的上層路線主要體現在學術層面，其目的在於通過適應時需的西學和切中時弊的議論，在思想上引起中國官僚和知識分子的共鳴。這種新思路深化了李提摩太借參政議政以影響中國上層社會的路線，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莫安仁對英國憲政的引介便引發了前述端方對中國憲政問題的深入思考。此外，莫安仁的活動還有利於增強廣學會的學術性，弱化其宗教色彩，助推其融入民國時期的學術網絡之中。除了連續多年在亞洲文會中的學術活動，1923 年莫安仁還曾主持接待中英庚款委員會訪問廣學會，其後他與胡適（1891-1962）建立了聯繫，至其 1930 年在上海別發洋行出版以中國為主題的隨筆集《新思維及其他》（*A New Mind and Other Essays*），《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執行主編費佩德（Robert F. Fitch, 1873-1954）首先想到的便是請莫氏的故交胡適撰寫書評。（鄒新明，2024 :521-527）

陸、代理廣學會總幹事

民國初年，隨著 1916 年李提摩太退休返國，以及 1920 年擔任總幹事的瑞思義因病退出，莫安仁成為廣學會內資歷僅次於季理斐的主事人員。1924 年因時任總幹事季理斐休假，莫安仁順理成章被推選為執行總幹事。此前，莫安仁已久經磨練，他不僅在陝西佈道時負責過廣學會設立在興安府的書庫，加入

廣學會後更從 1917 年起連續多年擔任出版委員會幹事，在出版發行方面經驗豐富，為其全面主持廣學會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雖代理時間僅有一年，但其時正是非基運動風起雲湧、險象環生的階段，在季理斐應對乏力的前提下，莫安仁頗具魄力的進取舉措在廣學會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莫安仁主政的 1924-1925 年之間，1922 年興起的非基運動捲土重來，要求收回教育權成為重要議題，再加上五卅慘案導致中國民眾對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強烈抵制，廣學會面臨十分嚴峻的局勢。（C. L. S., 1925: 1-5；另見羅偉虹，2016：387-403）除了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在思想文化領域，因重心轉向宗教出版，而宗教題材的作品易受抵制，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在學校和知識階層中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以致在新文化運動中被邊緣化，舉步維艱。1924 年 5 月在英休假期間，莫安仁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廣學會母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at Glasgow）¹³的年會上痛陳，雖然中國社會日益重視文字的作用，但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教會借此進行宗教宣傳的意圖，這無疑加大了廣學會工作的難度。（From Day to Day: The Rev. Evan Morgan..., 1924.6.27）不同於季理斐的保守溫和態度，莫安仁將這一困局視為難得的機遇，主張調動各種資源，積極推動廣學會的編譯出版事業。在基督教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敵對之時，莫安仁堅持以文字作為衛教武器，在 1924 年上任伊始的年會上他即表示：「當前排外與反基督教的情緒正在不斷傳播，廣學會將不得不動用一切力量來與這股邪惡力量作戰，而基督教出版物將是能使用的一種最強武器。」（C. L. S., 1924: 49）

在莫安仁的領導下，廣學會的出版事業迎來了一個難得的高峰。在數量上，除開待印的著作，當年正式出版的新書即有 60 種，而上一年度和下一年度僅有 38 種（何凱立，2004：93），規模達到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最高值，銷售額也逆勢增長（C. L. S., 1925: 13）；在主題上，為應對甚囂塵上的非基言論，護教書籍的出版尤其令人矚目，莫安仁不僅本人編譯了《成人論（進化上的研究）》、《科學與人生》和《質疑答辯》三種著作，還動員熟知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牧師陳金鏞（1868-1939）和傳教士英雅各（James W. Inglis, 1861-1943）等人，

¹³ 廣學會歷年來之所以能夠維持，主要得力於外國差會和各種文教組織的捐款，其中位於韋廉臣故鄉英國格拉斯哥的廣學會母會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出力尤多。（王樹槐，1973）由於極度依賴母會的資助，廣學會於 1905 年在季理斐的倡議下將其英文名由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改為與其母會一致的同名機構。

編著了《上帝自在論》、《基督教利吾國乎》、《宗教與進化》、《闢基督抹殺論》和《疑問匯答》等諸多應時之作。其中頗值一提的是由英雅各所著、聶紹經所譯之《闢基督抹殺論》。此前，日本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1871-1911）所著之《基督抹殺論》經朱執信（1885-1920）和劉文典（1889-1958）的引介翻譯流傳甚廣，已然成為非基運動的重要理論源泉，而《闢基督抹殺論》則無疑是廣學會審時度勢後推出的切題之作，「該書雖然存在某些宗教信仰的成分，但論證邏輯清晰、材料翔實，有效地消除了一些基督徒因受《基督抹殺論》影響而產生的疑惑」。（李長銀，2016：223）誠然，包括《闢基督抹殺論》在內的論著還不足以平息如火如荼的非基浪潮，但卻是廣學會首次對非難基督教的種種言論進行如此集中的辯駁。

針對中國社會批判教會學校並要求收回教育權的呼聲，廣學會也有的放矢，編譯了《教會學校與文化侵略》、《教會學校與地方學校之比較》和《宗教教育與國魂》。其中，《宗教教育與國魂》作者為上海滬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韋雅谷（James B. Webster, 1879-1929），譯自其出版於1923年的專著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在此書中，韋雅谷廣引中西文文獻，力圖論證基督教教育在塑造中國國民意識中的功用¹⁴。由於編著者均為一時之選，甚至是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這些頗具理論深度的書籍直至1928年仍再版發行，貫穿了非基運動的整個高峰期，反映了廣學會所作出的細緻籌劃與努力。

此外，廣學會還正面回應了佛教復興帶來的信仰方面的挑戰。20世紀20年代，由於中國知識界和政界對佛教的推動，特別是太虛法師（1890-1947）等人的積極運作，佛教迎來了復興（C. L. S., 1925: 5-6），甚至是迎來了又一個「鼎盛時期」（葛兆光，2006：123）。在對佛教所持的態度方面，廣學會因是教會聯合組織，內部成員自由派和基要派均有，但畢竟從事的是間接佈道的文教活動，自由派思想於大多數時期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因此該會對佛教的批評和研究總體上較為溫和，至多不過是以基督教思想闡釋佛教教義，李提摩太翻譯大乘佛教經典時便是如此。（李智浩，2005）從學理上而言，廣學會此前已從比較宗教學的視角對佛教有所考察，但少有專門論述，僅有1916年出

¹⁴ 韋書多處引用莫安仁編輯的漢語教科書《文言與中國思想導讀》中《聖哲畫像記》、《朱子讀書法》、《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和《湖南時務學堂約》等篇章的譯文，將其作為立論的重要依據（Webster, 1923: 310-312），這又從另一個角度映射出了莫安仁文字工作在神學佈道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雙重屬性。

版的《佛教今昔觀》，作者英雅各雖對中國宗教頗有研究，但其身份在剖析佛教時卻難免隔膜。

在莫安仁的主持下，廣學會於 1924 年 11 月適時推出了王治心的《基督徒之佛學研究》，專門回應了佛教對基督教的責難，甚至對佛教也不無批評。王治心國學造詣深厚，是中國宗教思想史領域的專家，堪稱以基督徒身份研究佛教的不二人選。此前他已與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資深編輯、前廣學會文士范禕（1866-1936）合編過《評基督抹殺論》，對非議基督教的種種思想進行了有力的辨正。《基督徒之佛學研究》由同樣對佛教頗有研究的陳金鏞作序，並經挪威神學家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校勘，後成為廣學會研究和辯駁佛教思想的代表作¹⁵。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傳教士中的開明派，莫安仁從未強烈排斥甚或詆毀佛教，而是承襲了李提摩太以耶釋佛的路徑。他曾在《教務雜誌》上連載長文探討佛教中的基督教因素（Morgan, 1911a, 1911b）¹⁶，1935 年退休前夕甚至出席過招待佛教領袖太虛法師的活動（圖 4）。然而在非基運動引發信仰交鋒之際，為適應形勢需要，廣學會必須有所作為，而莫安仁也不得不有所變通，側面反映了他教會利益至上的出版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期間，莫安仁曾對加強教會文字工作本色化的倡議表示明確的支持，視其為極其迫切的任務，並將「中華基督教文字事業促進會」（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ian Literature，後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文社）的組建視為難得的進步，認為這有助於改善廣學會單打獨鬥的境況，但同時也強調，找到合乎要求的中國作者是本色化過程中最大的難題。（C. L. S., 1925: 7-8）在多年的編譯生涯中，雖然莫安仁以口譯筆述的方式和華人編輯共同著述，在譯著中也多處肯定許家惺和周雲路等合作者的功績，但他對華人作者獨立撰述的能力卻長期持懷疑態度，堅持認為：

¹⁵ 此書除了總體上回應佛教對基督教的辯難外，還特別針對宗教學者張純一同年出版的《佛化基督教》一書。張氏曾在上海震旦學院等教會學校求學及工作，後由武漢聖公會受洗入教，早年傾向革命，曾加入日知會，1909 年入廣學會，主要輔助季理斐譯書辦報，本人著述亦頗多。張氏約於 1919 年離開廣學會，轉而親近佛學，其《佛化基督教》即為以佛釋耶、調和二教的嘗試，受到廣學會在內的基督教人士的責難。（何卓恩、李濤，2023）

¹⁶ 事實上，莫安仁是典型的自由派傳教士，其以耶釋佛、佛耶融通的神學觀點曾引起基要派傳教士的批評，他們認為莫氏的比較宗教學研究不應將基督教納入其中，其論說也不適宜登載在《教務雜誌》這樣一份以傳播基督教為己任的刊物上。（陶飛亞，2013：401）

真理沒有中西，西方人所要的真理，自然也是華人所共要的。西方有許多經驗來貢獻華人，把世界基督教的各種背景來輔助這幼稚的教會，替牠奠個鞏固的根基；現在華人對於基督教的經驗是淺薄的，心靈的力量是荏弱的，所以在現代要本土的信徒流露出豐盛的文字來，這實在是種奢望。（莫安仁，1925：28）

在教會文字工作本色化的倡議提出有年的背景下，莫安仁顯然對華人同工的著述能力仍深表懷疑，認為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依然需要傳教士主導編譯出版事業，這一點與極力推動華人在廣學會內身肩重任的季理斐大不一樣，與彼時的社會形勢及華人教徒的訴求也多有抵牾。（李志剛，1997：168-170）儘管如此，莫安仁對文字工作本色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卻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支持嚴復（1854-1921）翻譯《聖經》中的在地化表述（李熾昌，2015）；此外，他對不同教派在文字佈道中的合作也持開放態度，如他曾給著名天主教徒馬相伯（1840-1939）所譯《西方搜神記》作序¹⁷。但總體而言，他在本色化運動中的表現並不積極，堅持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信徒在語言能力和感知上帝的靈性等方面不足之處尚多，無法真正地挑起文字佈道的大樑。

由於莫安仁相對保守的態度，與其合作的華人編輯在翻譯著述方面因而長期處於次要地位，即使是應對非基運動最需要華人作者衝鋒陷陣的緊要關頭，他們也鮮有獨立撰述的機會，這無疑不利於符合中國國情和現實需要的基督教文學早日在華落地生根。但即便如此，莫安仁的工作仍稱得上卓有成效，在廣學會無比艱難的時刻，他殫精竭慮，不辭辛勞，除擔任總幹事外，還兼任出版幹事和辦公室司庫（C. L. S., 1925: 19-20），使得該會在劇烈變動的年份逆勢而上，再創新高，取得了頗為亮眼的成績。特別是與青年協會書局等其他教會出版機構相比¹⁸，憑藉主題集中且為數眾多的書籍，莫安仁主持下的廣學會堪稱教會中抵制非基言論、維護基督教聲譽的中流砥柱，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該會

¹⁷ 另據筆者所知，《西方搜神記》所據原本為英國文學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出版於1856年的 *The Heroes, Greek Fairy Tales*，譯者署名馬紹良，即馬相伯，1912年由廣學會出版。其主要內容雖為希臘神話故事，但其用意仍在宣傳上帝的福音。該書未收錄於1996年由朱維錚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之《馬相伯集》，學界論及此書者亦不多見。

¹⁸ 僅以新書數量而論，教會中規模僅次於廣學會的青年協會書局雖然也積極應對非基運動，但其1924年僅出版新書14種，1925年極盛之時也只有39種，後迅速減少，遠遜於廣學會。（何凱立，2004：109-110）

在基督教出版界的領導地位。

柒、結語

在廣學會從事著述的三十年間，莫安仁的重心雖在編譯與福音相關的書籍，但也並未放棄譯介西方實用新知。特別是在李提摩太等傳教士的影響下，他在漢學研究領域也頗有成績，堪稱 20 世紀初英國在華傳教士漢學家的代表人物。事實上，莫安仁在漢學研究領域的成就與其在廣學會內的編譯成就相比毫不遜色，他不僅在《教務雜誌》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發表了數量眾多的書評和論文，還因翻譯注解《淮南子》而成為西方世界系統譯介研究該書的第一人。其研究論著大多收錄於法國漢學家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編著的《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Cordier, 1922: 3539、3761、3767），是西方學界研究《淮南子》及道家學說的必備文獻。

此外，因與李提摩太同為威爾士同鄉且同屬浸禮會，再加上受到李氏傳教理念的影響，莫安仁在文字事工和廣學會的發展等方面與其多有契合，延續了後者主政期間的諸多傳統。秉持社會福音的傳教理念，莫安仁不僅將李氏奠基的以西學啟蒙為中心的編譯出版事業引向深入，還極大擴展了後者倡導的上層路線，由結交影響政治人物轉向文教領域的知識分子，使得廣學會在學術領域也有所突破。莫安仁不僅本人在漢學研究領域卓有成就，還與鄭孝胥和胡適等知名學者往來，在其主編亞洲文會會刊期間亦發表了同仁英雅各、勵德厚（Harrison K. Wright, 1877-1923）和梅益盛（Isaac Mason, 1870-1939）等人的作品，從而在廣學會內部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這一切與後李提摩太時代的主政者季理斐相比多有不同，季氏集中於神學領域的著述研究，雖具備良好的漢學基礎，但他以編譯直接傳道的文字為己任，未能在學術研究領域有更大的成就；與此同時，他的神學觀念較為保守，一度與李提摩太關係緊張。（Brown, 1968: 132-137）可以說，莫安仁才是廣學會內繼承李提摩太衣鉢的傳教士。

誠然，莫安仁的活動難免受到廣學會集體意志和總體方針的制約，但其存在無疑是對該會功能和社會形象的難得補充，這一點也得到上海西人的極大認可。1930 年當莫安仁在中國生活長達四十六年並迎來七十歲生日之時，彼時國內最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便大

幅報導了他在中國的事蹟，同時高度評價了他在福音傳佈、漢學研究和僑民社區發展等領域的貢獻。（46 Years' Service in China, 1930.10.1）然而，儘管莫安仁編譯的著作在清末新政和民國時期的宣教運動中都曾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廣學會巔峰已過的時代，即使他本人再努力，也無力扭轉其在中國知識界中日漸消頹的跡象，而莫安仁的著作中除了有關進化論的部分曾引起教外讀者注意外，其餘的都少有波瀾。此外，雖然莫安仁極具人文關懷的社會福音傾向使他對儒道文化較為寬容，但其目的也多是在比較文化或比較宗教學的視角下顯揚基督教文明的普適性和優越性。值得玩味的是，莫安仁的文化調和主義立場在其身後曾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有論者發文高度評價他對儒家文化的推崇，時任廣學會總幹事林輔華不得不回應澄清，指稱莫安仁是虔誠的基督徒，其基督教信仰是奉持不疑的。（Allen, 1941.8.16）總之，人文關懷和福音傳播是莫安仁文字事工的兩個側面，兩者相輔相成，不僅延續了李提摩太以來廣學會的多重面向，也給該會的編譯出版事業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

輔仁
宗教研究



圖 1：莫安仁（Evan Morgan）（C. L. S.,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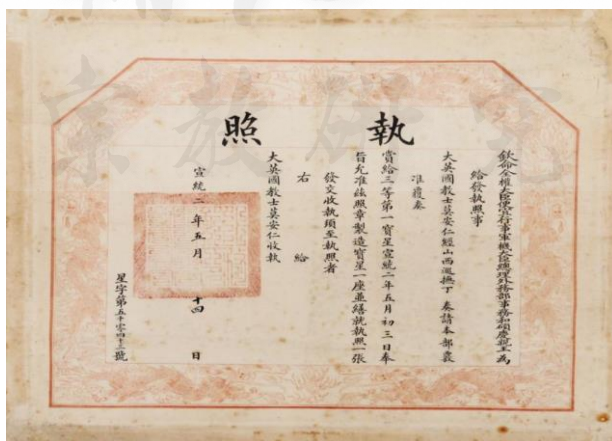


圖 2：莫安仁獲得清廷頒賜寶星的執照
（圖片來源：2022/12/20，<https://www.mxqiqi.com/auction.item.info/1027577>）



Rev. J. E. Cardwell. Miss H. C. Bowser. Dr. A. P. Parker.
Miss McNeely. Rev. W. A. Cornaby. Rev. W. N. Bitton.
Dr. MacGillivray. Dr. Timothy Richard. Rev. Evan Morgan.
FOREIGN STAFF OF THE C. L. S.

圖 3：莫安仁（前排右一）與李提摩太等廣學會同事（C. L. S., 1911）



RECEPTION TO MONK T'AI HSÜ AND DR. KIANG KANG-HU.

The above group was invited to meet Monk T'ai Hsü and Dr. Kiang Kang-hu, formerly of McGill University and now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圖 4：莫安仁（右一）與廣學會同人參與接待太虛法師
（圖片來源：《The Chinese Recorder》，1935，66，4）

參考文獻

- 丁寶銓（1915）：〈社論：大同月報序〉，《大同月報》，第1卷，第1期：頁1-2。
- 上海市檔案館。《廣學會書刊目錄》。檔案號：U131-0-90。
- 上海民國日報社（1922）。〈輿論：莫安仁論孫總統為惟一解決中國之人〉，《新建設的中國》，上海民國日報六周紀念增刊：頁175-176。
- 上海圖書館編（2008）。《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萃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于右任（1986）。《于右任辛亥文集》，傅德華（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王京強（2014）。〈社會福音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探析〉，《世界宗教研究》，第6期：頁130-137。
- 王治心（2004）。《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毅（2005）。《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王樹槐（1965）。《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樹槐（1973）。〈清季的廣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頁193-227。
- 田文裁（2002）。〈試論新教在華出版事業〉，《基督教學術》，第1輯：頁308-338。
- 立夫（譯）（1925）。〈一個基督教著作者之經驗〉，《中華基督教文社月刊》，第1卷，第2期：頁23-29。（Evan Morgan 莫安仁，1925）。
- 江文漢（1964）。〈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頁1-42。
- 何兆武（1961）。〈廣學會的西學與維新派〉，《歷史研究》，第4期：頁21-44。
- 何卓恩、李濤（2023）。〈從「歸命基督」到「暢敷佛化」——張純一改宗信仰考述〉，《世界宗教研究》，第6期：頁82-96。
- 吳永貴（2011）。《民國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吳義雄（2000）。《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李志剛（1997）。〈廣學會之發展與中國時局轉變之關係〉，《百年煙雲 滄海一粟：近代中國基督教文化掠影》，頁 148-162。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 李志剛（1997）。〈廣學會出版事業對時代轉變的適應〉，《百年煙雲 滄海一粟：近代中國基督教文化掠影》，頁 163-178。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 李長銀（2016）。〈幸德秋水《基督抹殺論》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1 期：頁 220-225。
- 李振江（2015）。《李提摩太「世界聯盟」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碩士論文。
- 李智浩（2005）。〈中國耶佛對話的再思——李提摩太以耶釋佛的個案〉，《輔仁宗教研究》，第 11 期：頁 181-204。
- 李熾昌（2015）。〈中國語境中的外來經典——嚴復之《馬可福音》翻譯嘗試〉。《基督教文化學刊》，第 33 輯：頁 36-54。
- 李巍（2003）。〈季理斐在廣學會活動述評〉，《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頁 80-87。
- 沈國威（2009）。〈傳教士與 20 世紀初的新漢語——以 Mateer 和 Morgan 的兩本書為例〉。《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頁 74-77。
- 周建人（1919）。〈生物之起源〉，《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頁 60-63。
- 孟慶波、高旭（2018）。〈西方漢學中的《淮南子》翻譯——基於英文書籍的文獻史考察〉，《國際漢學》，第 3 期：頁 58-71。
- 姜劍（2021）。《英國來華傳教士高葆真的文化傳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和國際交流學院博士論文。
- 茅海建（2021）。《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孫邦華（2000）。〈李提摩太與廣學會〉，《江蘇社會科學》，第 4 期：頁 161-167。
- 徐惟岱（述）（1906）。〈外論：論國家整頓財政之要〉，《萬國公報》，第 214 冊：頁 31-41。（Evan Morgan 莫安仁，1906）。
- 徐惟岱（述）（1907a）。〈論著：論本報大同之宗旨〉，《大同報》，第 7 卷，第 3 期：頁 5-6。（Evan Morgan 莫安仁，1907）。
- 徐惟岱（述）（1907b）。〈社說：化除滿漢畛域議〉，《萬國公報》，第 225

- 冊：頁 1-4。（Evan Morgan 莫安仁，1907）。
- 高永偉（2021）。〈莫安仁和他的《中英新名辭典》〉，《辭書研究》，第 4 期：頁 101-109。
- 國家圖書館編（2021）。《民國時期圖書總目・宗教》。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張海林（2007）。《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湧（2018）。《李提摩太西學著譯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張德明（2013）。〈福音東傳：英國浸禮會在華佈道事業論略〉，《宗教學研究》，第 1 期：頁 182-187。
- 張曉編著（2012）。《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明末至 191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梁元生（1978）。《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莫安仁（1911）。〈論說：論人類天演進化之理由〉，《大同報》，第 14 卷，第 21 期：頁 1-4。
- 莫安仁（1915a）。〈時事論說門：國家果可不重道德耶（選錄《大同報》）〉，《新民報》，第 2 卷，第 4 期：頁 96-97。
- 莫安仁（1915b）。〈內外時報：論國家道德之儲力〉，《東方雜誌》，第 12 卷，第 4 期：頁 13-14。
- 莫安仁（1915c）。〈社論：國家果可不重道德耶〉，《大同月報》，第 1 卷，第 3 期：頁 7-11。
- 莫安仁（1916）。〈社論：論壓制報館之無益於國〉，《大同月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5。
- 莫安仁（1917）。〈報紙自由說〉，《東方雜誌》，第 14 卷，第 4 期：頁 170-172。
- 莫安仁（1918a）。〈來函：武人干政，亡國之兆也，中國武人其聽諸〉，《時報》，5 月 2 日：第 6 版。
- 莫安仁（1918b）。〈武人干政，亡國之兆也〉，《神州日報》，5 月 2 日：第 2 版。
- 莫安仁（1927）。〈悼李佳白博士〉，《國際公報》，第 5 卷，第 47-48 期：頁 1-5。

- 莫安仁、徐惟岱（1907a）。〈論著：論奉天通報館被封事〉，《大同報》，第8卷，第1期：頁2-6。
- 莫安仁、徐惟岱（1907b）。〈論著：論古今進化退化之機關在於道德〉，《大同報》，第8卷，第20期：頁1-5。
- 莫安仁、徐惟岱（1911）。〈論說：書西班牙志士費勒爾以革命被誣慘殺記後（附圖）〉，《大同報》，第15卷，第25期：頁4-7。
- 莫安仁、徐惟岱（譯）（1909）。《新譯英國憲政輯要》。上海：廣學會。（Frederick Wicks 維克師，1872）。
- 莫安仁、許家惺（譯）（1911）。《宇宙進化論》。上海：廣學會。（J. Arthur Thomson 湯穆森，1908）。
- 莫安仁、許家惺（譯）（1913）。《生命世界》。上海：廣學會。（Alfred R. Wallace 華麗士，1910）。
- 莫安仁、管鶴（1907）。〈論著：報紙之力量與功效〉，《大同報》，第8卷，第21期：頁1-2。
- 郭至汶（2019）。〈上帝為體，西學為用——晚清傳教士李提摩太傳播西學的挑戰與回應〉，《新史學》，第30卷，第3期：147-184。
- 陳建明（2015）。〈清末基督新教在華出版機構同文書會研究〉，《宗教學研究》，第3期：頁206-215。
- 陳建明、王再興（譯）（2004）。《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Herbert Hoi-Lap Ho 何凱立，1988）。
- 陳喆（2013）。〈季理斐與廣學會文字佈道事業的發展〉，《宗教學研究》，第1期：頁188-193。
- 陳鈴（2018）。〈新中國成立初期基督教出版業走向聯合的前因後果〉，《東岳論叢》，第5期：頁78-90。
- 陳德明（譯）（1937）。〈廣學會史略〉，《廣學會五十週紀念短訊》，第1期：頁3-8。（Albert J. Garnier 賈立言，1937）。
- 陶飛亞（2013）。〈《教務雜誌》研究〉，李靈、陳建明（主編），《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頁383-41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傅蘭雅（1880）。〈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續前卷）〉，《格致彙編》，第3年，第6卷：頁9-11。
- 程躍（2023）。〈英語世界中的《淮南子》選譯研究——從「老子注腳」到「主

- 題研譯」），《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20-26。
- 楊華波（2020）。〈擺印善書，散播天下：作為翻譯出版贊助者的廣學會〉，《翻譯界》，第11輯：頁136-152。
- 葉再生（2002）。《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北京：華文出版社。
- 葉柏華（譯）（1937）。〈廣學會今年工作概況〉，《廣學會五十週紀念短訊》，第6期：頁3-22。（Charles W. Allan 林輔華，1937）。
- 葛兆光（2006）。〈十年海潮音——20世紀20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講》，頁114-1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鄒振環（1996）。《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 鄒新明編著（2024）。《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來往書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鳳媛（2024）。〈來華西土的漢語教科書與清末語言變革——以莫安仁的《官話彙編》為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83-92。
- 熊月之（1994）。《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熊月之主編（2022）。《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趙曉蘭、吳潮（2011）。《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廣學會編（1923）。《廣學會三十六週紀念冊》。上海：廣學會。
- 鄭孝胥（1993）。《鄭孝胥日記》，第三冊，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北京：中華書局。
- 戴師鐸（筆述）（1907）。〈新不廢舊之旨〉，《大同報》，第7卷，第1期：頁8-10。（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1907）
- 韓一瑾（2018）。〈莫安仁（Evan Morgan）及其《中英新名辭典》諸版本研究〉，《中國語研究》，第60號：頁80-87。
- 羅偉虹主編（2016）。《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同文書會（前中國書刊協會）組織章程〉（1988.6），《出版史料》，第2期：頁31。
- 〈附錄：記大同報〉（1904.3）。《萬國公報》，第182冊：頁30上。

〈論著：大同報改良發刊詞〉（1907.3），《大同報》，第7卷，第1期：頁6。

46 Years' Service in China. (1930.10.1).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

Allen, C. W. (1941.8.16). Letters to the Editor: Dr. Evan Morgan: Confucianism.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4.

Aubrey, M. E. (1953). T. R. Glover: Review and Reminiscence. *The Baptist Quarterly*, 15, 4: 175-182.

Brown, M. H. (1938). C. L. S. Periodicals. In C. L. S. (Ed.), "No Speedier Way", *A Volume Commemorating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87-1937* (pp. 97-127). Shanghai: C. L. S.. (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U131-0-92)

Brown, M. H. (1968).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Toronto: The Ryerson Press.

C. L. S. (1906, 1908, 1924, 1925, 1935).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C. L. S..

Clayton, G. A. (1919). The Survey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8, 3: 366-377.

Cordier, H. (1922).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Couling, S. (1917).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 Walsh.

From Day to Day: The Rev. Evan Morgan... (1924.6.27).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8.

In Preparation. (1903.4). *The Chinese Recorder*, 34, 4: 206.

Morgan, E. (1911a).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Buddhism. *The Chinese Recorder*, 42, 1: 19-28.

Morgan, E. (1911b).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Buddhism (Concluded from p. 28, January Number). *The Chinese Recorder*, 42, 2: 98-105.

Morgan, E. (1925). Christian Literature—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56, 5: 314-318.

Morgan, E. (1928). Past and Present Aims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59, 1: 42-46.

Obituary: The Rev. Evan Morgan, D. D. (1941.8.8).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3.

Richard, T. (1916).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T. Fisher Unwin Ltd.

Webster, J. B. (1923).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Evan Morgan and the Publishing Enterprise of the C. L. S.

YANG Hua-Bo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Fudan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bstract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C. L. S.) was the largest publishing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a. During the knowledge gap and national crisis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periodicals and the books issued by the Society greatly accelerated changes in China's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and the New Policies refo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 well-known translator and author in Christian literature, although Baptist missionary Evan Morgan (1860-1941) was not able to utilize his talents at the prime of the C. L. S., he quick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nd active editors after joining the Society in 1906. Since then, he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editing and presiding over *The Chinese Weekly* or later the *Ta Tung Pao*, but also translated and compiled dozens of books on natural science, politics, and religions, which exerted widespread influence in both secular and church circles. In addition, in 1924, when the anti-Christian wave was emerging fiercely,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acting general secretary. Under his chairmanship, the C. L. S. shifted away from its previously conservative stance. Despite facing denial and criticism against Christianity by various ideological trend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 L. S. ushered to a new height.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gospel of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Morgan regarded books as a powerful tool for social enlightenment and evangelism, thus extending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former in the Society. In short, Evan Morgan's divers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literature great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 L. 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which consolidated the Society's enterprise and enabled it to occupy a position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refore, he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s a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Evan Morgan, C. L. S., *Ta Tung Pao*, 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